

華學誠 主編

文獻語言學

第四輯

“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華學誠 張猛）

談談張民權對萬光泰古音學未刊稿的發掘和評述（郭錫良）

清末兩種中西潮汕方言文獻音系比較研究（馬重奇 馬睿穎）

日僧湛奕著《淨土論注音釋》考論（梁曉虹）

文獻句讀法與《周易》卦辭（張猛）

《中華道藏》指瑕（劉祖國）

釋三晉文字中的“旬”及從“旬”之字（徐在國）

成語“日就月將”新詮（范常喜）

《三國志》發微（吳金華）

中華書局

主編 華學誠

學子語文獻

第四輯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獻語言學.第四輯/華學誠主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7.5
ISBN 978-7-101-12476-7

I.文… II.華… III.文獻學-語言學 IV.①G256②H0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57129 號

-
- 書 名 文獻語言學(第四輯)
主 編 華學誠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5 插頁 2 字數 300 千字
印 數 1-12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2476-7
定 價 68.00 元
-

《文獻語言學》編輯委員會

主 編 華學誠

副 主 編 張 猛

編 委 (按姓氏音序)

華學誠 梁慧婧 羅衛東 秦淑華 石定果

魏德勝 魏兆惠 徐朝東 張 猛 張希峰

立足事實分析 語文現象 依據文獻研究
漢語歷史貫通古今 探索演變規律 融
會中外構建學科理論 凝聚隊伍 成就
就學術流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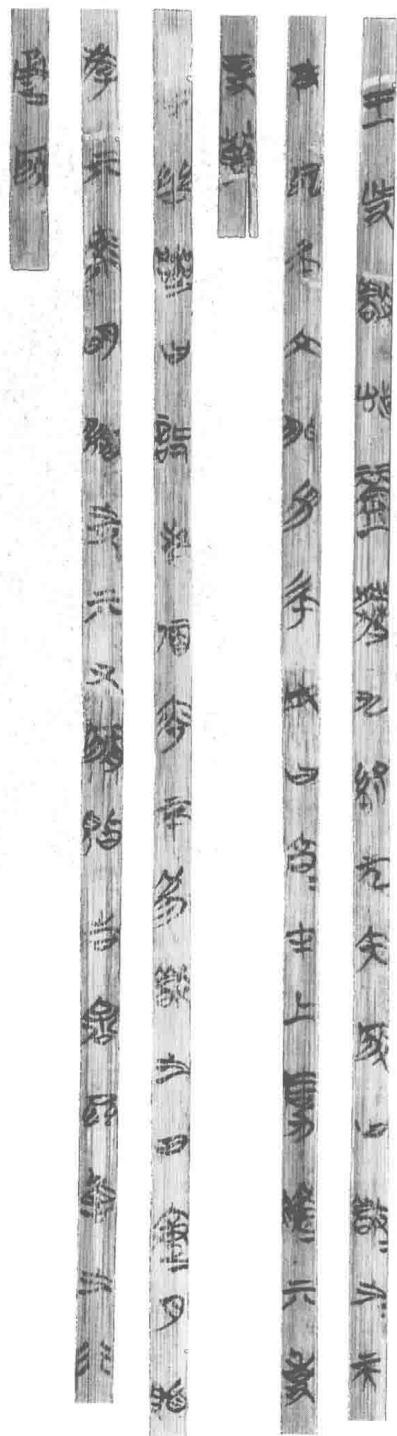
為文獻語言學題 乙未年 希亮



立足事實分析語文現象，
依據文獻研究漢語歷史，
貫通古今探索演變規律，
融會中外構建學科理論，
凝聚隊伍成就學術流派。

——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崔希亮教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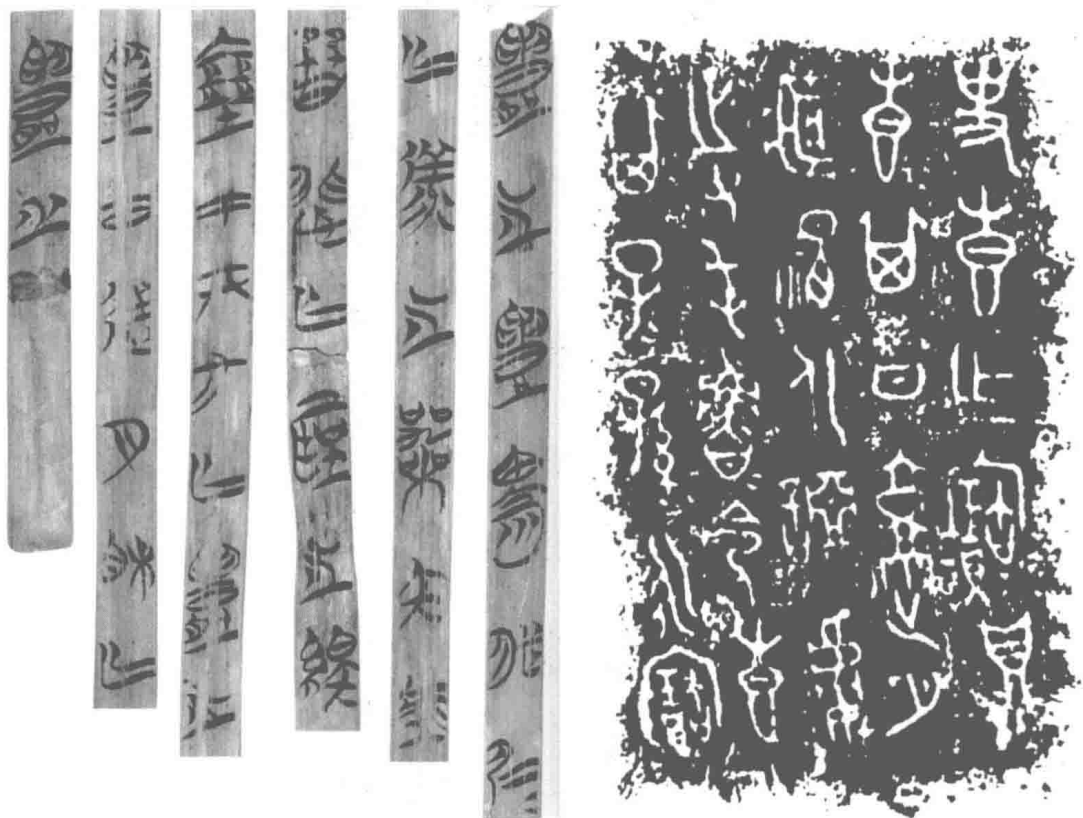
《成語“日就月將”新詮》附錄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第 2~3 簡^①



①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第 55~56 頁。

《成語“日就月將”新詮》附錄二：上博簡《民之父母》第 11 簡^①

附錄三：史惠鼎銘文拓本^②



①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 27 頁。

② 參看陳穎《長安縣新旺村出土的兩件青銅器》。

目 錄

第二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論文綜述	1
“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	華學誠 張 猛 4
談談張民權對萬光泰古音學未刊稿的發掘和評述	郭錫良 22
清末兩種中西潮汕方言文獻音系比較研究 ——《潮聲十五音》和《潮正兩音字集》音系比較研究	馬重奇 馬睿穎 33
日僧湛奕著《淨土論注音釋》考論	梁曉虹 49
從《字彙》音切的來源論字書、韻書音切比較的方法	高永安 王祥秀 63
文獻句讀法與《周易》卦辭	張 猛 70
清代滿漢合璧會話教材在漢語史研究上的價值	竹越孝 95
《中華道藏》指瑕	劉祖國 112
宋均緯書注的訓詁學價值	劉青松 120
釋三晉文字中的“旬”及從“旬”之字	徐在國 129
吐魯番出土《前秦韓瓮自期召弟應見事》箋證	王啟濤 133
成語“日就月將”新詮	范常喜 142
疑難字考釋十九則	張文冠 158
《匏有苦葉》之“軌”當取何解？	華建光 167
《三國志》發微	吳金華 178

京都流寓 書學傳古

——羅振玉及其書法文物鑒藏 張明傑 199

關於“羌胡”的標號問題

——《三國志》標點研究舉隅 何凌霞 219

稿 約 228

稿 例 229

第二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論文綜述

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學研究所

2016年10月30日到11月1日,第二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在北京舉行。著名語言學家郭錫良教授、王寧教授和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李宇明教授、校長崔希亮教授、副校長曹志耘教授先後出席了開閉幕式,並分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為論壇的成功舉辦確定了基調。

來自日本、中國的六十多位專家和三十多位研究生參加了論壇,共帶來了五十多篇論文。這些論文無論從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大大推進了文獻語言學的研究。論文涉及六個方面的內容,綜述如下:

第一,是關於文獻語言學學科問題的討論。如何進一步深化對文獻語言學內涵的理解、如何定位其學科性質,是本屆論壇討論的重點。華學誠、張猛《“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著重從歷史的角度闡述“文獻語言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內涵與外延,以及該學科與現行學科體系中諸學科的關聯,定義“文獻語言學”是“以文獻為主要資源,綜合運用中外語言文字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及其歷史和內在發展規律的科學”。郭錫良《談談張民權對萬光泰古音學未刊稿的發掘和評述》,對張民權關於萬光泰古音學的發掘和研究提出了商榷意見,強調文獻研究要儘量客觀,在引用戴震“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之語後強調指出,我們要努力克服這三難。張民權《萬光泰與王念孫》一文,堅持自己的意見,並在討論時回應了郭錫良的質疑。學問的真理愈辯愈明,我們的論壇歡迎學術爭鳴。王寧《解讀與積纍:文獻語言學的根本問題》認為,語言學研究既要開掘基本原理,也要注重閱讀第一手材料,注重文獻的解讀和積纍,這是漢語研究的根柢,她提出了文獻考據要做到“六安”,給與會者很大的啟發。馮勝利《段王科學理念資料彙編的理論設想和材料整理》,提出了段王科學理念的研究思路與方法,認為段王科學理念的本質是“理必”,指出乾嘉的科學傳統是文獻語言學必須繼承的寶貴遺產。

第二,是關於文獻語音學的研究。學者們圍繞各式各樣的音韻文獻,展示了音韻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對傳統經典文獻的最新研究,如張渭毅《論〈集韻〉不是〈切韻〉系韻

書》，楊軍《〈經典釋文〉反切結構的類型、層次及音韻性質》。更多的則是對其他材料的發掘與考究，如李軍從《太古元音》的研究出發探討等韻與時音的關係，高永安從《字彙》音切的來源論字書、韻書音切的比較方法，都是由點及面的討論。徐朝東從竺法護譯經中考察“晉言”，李建強從譯經版本的研究出發探討梵漢對音系統的歷史遷移，喬秋穎對兩漢鏡銘用字的音韻考察，所涉都是值得在研究中利用的好材料。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將音、義結合起來研究，如周遠富《〈通雅〉“打”字都瓦切疏議》、康國章《“賣”和“賣”的音義考察》、齊曉燕《從稟諧聲的字音分析舉例》、趙團員《“休”的變韻構詞研究》、丁姝《“揭”字音義考》、孫瑩《〈通雅〉與音義關係研究》都是這方面的文章。王寧強調的“六安”中就提到“音安、義安”，將音義結合起來進行探究，這一取向值得肯定。

第三，是關於文獻詞彙學的研究。盧烈紅《〈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詞形考辨三則》從詞典釋義引發問題，追溯古代文獻，以古證今。張美蘭《從異文角度看〈官話指南〉的口語詞語義》，展示了域外傳教士記錄的漢語文獻在詞彙史研究方面的價值。徐正考《假性局部同素反義名詞研究》，對假性局部同素反義名詞的構成特點進行了分析，角度新穎。萬久富對郭璞注引《爾雅》“蝮馬者蝮”中“蝮”字語源的考察，任繼昉對“御”字的考釋，楊琳對“潑天關”一組詞的考釋，華建光對《匏有苦葉》中“軌”字的考釋，龐光華對《楚辭》“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一句的詮釋，范長喜對成語“日就月將”的新解，馬藝萌《論“灤”與“鬻”》對楚方言詞的考釋，閻豔對名物詞“茄子”的考釋，都生動有趣地展示了傳統訓詁學和現代詞彙學結合的碩果。

第四，是關於文獻文字學的研究。孫玉文《同形字舉例》對不相關詞用一個字形記錄的同形字現象，進行了舉例性實證分析。王啟濤《吐魯番出土〈前秦韓瓮自期召弟應見事〉箋證》對吐魯番出土的十六國時期一則文獻進行了箋疏與考訂。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文獻校勘》從個案例子入手，探討了疑難字考釋與文獻校勘的基本操作方法。趙平安《兩條新材料與一個老故事》利用出土文獻，深入闡釋了“炮烙之刑”的含義。胡敕瑞《“弄、美、筭、兵”的形誤》對這幾個字在古文字當中的形誤情況作了分析，並討論了與之相關的文獻解讀問題。王立軍《談朱駿聲轉注系列中的字形問題》、王貴元《對〈說文解字〉的四大誤解》分別對轉注、假借進行了重新解讀，探討深入，分析精細，引起與會學者的重視。

第五，是關於文獻語法學的研究。歷史語法研究的文章雖然不多，但研究者都認為歷史語法的研究必須依賴古代文獻。魏兆惠《早期西方漢學家對漢語語序的思考及啟示》立足於西方漢學家的語法文獻，進行客觀分析，深入解讀。竹越孝《清代滿漢合璧會話教材在漢語研究史上的價值》介紹了這部會話教材的整理情況，分析了其詞彙和語法特點。洪波的《先秦句末助詞“矣”的詞彙來源問題》討論了“有”和“矣”在表已然的功能。

能上存在替換關係，頗有新意。張美霞《試論言說對象介詞“對”的演化》具體探討了一個微觀語法現象，對其語法功能演變的觀察與分析頗為深入。

第六，是關於語言學文獻的研究。董志翹《千錘百煉鑄精品，字斟句酌惠學林——評中華書局〈廣雅疏義〉》，將錢大昭的《廣雅疏義》與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進行了比較，指出《廣雅疏義》的出版對文獻學、訓詁學、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梁曉虹《日僧湛奕著〈淨土論注音釋〉考論》，對這部佛教音義書的版本流傳、體例內容等進行了考校。王雪波《從語言風格角度試證〈方言〉作者》用科學統計方法描述語言風格，並據此考訂《方言》作者，這是一個新嘗試。蕭旭的《〈韓詩外傳〉校補》、張維的《〈方言據〉用例勘誤分析》則是對具體文獻所進行的考訂。

“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

華學誠 張 猛

(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學研究所,北京,100083)

提 要:從現行學科體系來看,文獻語言學是一個交叉學科;但從歷史發生的角度來看,文獻語言學自有其純粹的血統。本文提出的簡明定義是:文獻語言學是以文獻為主要資源,綜合運用中外語言文字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及其歷史和內在發展規律的科學。本文著重從歷史的角度闡述“文獻語言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內涵與外延,以及這個學科與現行學科體系中諸學科的關聯。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往往能帶來新的發現,催生新的進步;當一門古老的學科主動地、有意識地與現代諸學科結合起來之後,自然會有新的發現和新的進步。

關鍵詞:文獻語言學;歷史語言學;學科體系;中國語言學

本文把“文獻語言學”置於學科體系概念下討論,即使涉及學術史、學術研究等屬於學術體系的具體內容,出發點和目標仍然是為了論述“文獻語言學”的學科特點與地位,仍然是為了論述“文獻語言學”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一、語言文字學在中國歷代學科體系中的位置

孔子整理古代文獻時,歸納出“六藝”,即《詩》《書》《易》《禮》《樂》《春秋》,這可以稱為中國學科分類的萌芽。而中國學科體系的系統建構則肇自漢代,語言文字學已經納入了這一體系。

西漢劉歆在其父劉向所撰《別錄》的基礎上完成了《七略》,它是中國學科體系建立的標誌。《七略》除了總論《輯略》之外,將已經著錄的書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大部分,也叫六分法。《七略》雖已亡佚,但因《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是以《七略》為基礎編纂的,所以據此可以瞭解《七略》的具體分類和

每類之下所包括的著作。

《漢志》有六略38類，其中“六藝略”之下分爲“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9類。根據“小學”書目之後的小序可知，《七略》《漢志》的“小學”主要指文字之學。另外在第八類“孝經”中還收入了三種語言文字學類著作：“《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爾雅》《小爾雅》重在解釋詞語意義，應屬訓詁類。《古今字》已亡佚，參閱劉歆所論可知：“古字”當指西漢初年民間“書師”整理李斯等人所作三種字書合編而成的《倉頡篇》中所收字，所謂“《倉頡》多古字”；“今字”或指元始（漢平帝年號，公元1~5年）以後，揚雄《訓纂篇》和劉歆續揚雄所作十三章所收字。因此，《古今字》當屬字書。

中國學科體系至西晉發生了變化，改六分法爲四分法。爲了適應文獻不斷增多的需要，晉武帝時秘書監荀勗與中書令張華仿依《魏中經簿》編成《中經新簿》，開始採用“甲乙丙丁”四部分類，至《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改用“經史子集”四部之名，自此沿用一千三百多年。

《隋志》是我國現存正史中第二部史志目錄，在“經史子集”四部之後附入道佛二家。《隋志》經部之下有“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書、小學”10個大類，比《漢志》增加了一類“緯書”。第十類“小學”總共收入“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隋志》編者認爲，《爾雅》《廣雅》《小爾雅》《方言》《釋名》等著作是“解古今之意”，加上“五經總義”，都歸入了“論語”類，這與《漢志》的歸類不同，但《漢志》《隋志》均未將雅書系列歸入“小學”類。《隋志》“小學”分爲訓詁、體勢、音韻三類，所收著作除了數量上大幅度增加之外，內容上也有重要擴展，其小序對此有特別說明^①：

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埤倉》《廣倉》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並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①《隋書·經籍志》、《二十五史》本第五冊總第33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

由此可見,《隋志》的“小學”除了雅書系列、五經總義之外,主要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還包括民族語言。宋代晁公武的論述應該是本此而來:“文字之學凡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衡縱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制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①

《隋志》的分類和晁公武的闡述表明,“小學”至遲從此已經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四部分類法形成之後就基本定型,但其內部的小類會同中有異,例如《舊唐書·經籍志》甲部(即經部)劃分為12類,其中“十一曰詁訓,以紀六經讖候。十二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好像把“訓詁”和“小學”分置於並列的兩類之中。其實《舊唐書》作者是將“訓詁”理解為闡釋經義而非詞語考釋,所以收入的主要是讖緯書和經義雜解類著作。“小學”類中實際收錄了“《爾雅》《廣雅》十八家,偏旁音韻雜字八十六家”^②,即今日所言文字、音韻、訓詁類著作。

學術史研究者一般認為,作為語言文字學的“小學”在古代中國是經學的附庸,換言之,他們認為“小學”在古代中國並沒有取得獨立學科的地位。各家表述的具體理由雖不盡一致,但下述幾點則是共同的:“小學”從漢代建構學科體系時就綴於後來稱之為經學的《六藝略》之末;此後內容雖不斷增益,歸類上也有所調整,但是這一地位直至《四庫全書》都沒有根本變化。“小學”的產生就是為了讀經,漢代“小學”的系統之所以能夠建立,也是“經今古文”之爭直接影響的結果,其後輔助讀經而不涉義理仍然是“小學”的基本任務。《爾雅》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被列入“小學”類中,其地位高於“小學”,漢代曾為之設立博士,唐宋時期甚至進入經書行列。這是因為《爾雅》中的詞語及其解釋基本上都是從上古文獻典籍中直接輯錄出來的,“出身”於經書;所收的詞語都是文獻詞彙中的核心部分,相關的解釋則反映了這些詞語的典型用法。這些詞語及其解釋不僅不同於後世的注疏,其本文就須要解釋。然而,從書的性質上來看,《爾雅》可謂目前所見最古老的注疏彙編,是“小學”的奠基之作。

由傳統目錄學反映出的古代中國學科體系所顯示的“小學”,看上去確實只不過是附屬於經書、服務於讀經的文獻。但是,語言學史的研究發現,史實與此並不完全吻合。語言學史昭示,古代中國語言文字學學科萌芽於先秦,建立於漢代,隨着東漢魏晉時期音韻學的興起,以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為基本學科內涵的獨立學科就已經形成。這一學科雖然一直把解釋經典文獻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之一,但這並不是它的全部任務,在語言文字學科建立的漢晉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不少真正的語言文字學研究專著,揚雄《方言》描

① 晁公武《郡齋讀書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 《舊唐書·經籍志》,《二十五史》本第五冊總第37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

寫解釋的是方言口語，許慎《說文》分析探求的是漢字及其本義，劉熙《釋名》致力追尋的是日常用語的得名原由，呂靜《韻集》借助反切把漢字按讀音進行了系統分類，這些著作都不為特定經典文獻服務，毫無疑問，它們都已經具有了語言文字學研究的性質。歷代中國語言文字學既有專門研究具體文獻中語言文字問題的注疏著作，又有基於經典文獻而又超越某一文獻專書去探究語言文字自身問題的專門著作，這兩個方面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在不斷累積、不斷變革、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到達了清代的輝煌。

清代“小學”的成就及其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研究者已有基本一致的定評。本世紀初雖有異議（如梅祖麟等），但因提出異議的學者缺乏對清代學術的瞭解，更因為他們對中國學術懷有偏見，因此在材料不完整、分析未到位、推理失嚴謹的情況下，所立諸論皆站不住腳^①。對於清代學術的成就，在美國學界本有客觀公正的評述，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其備受西方漢學界推崇的著作《從理學到樸學》（*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亦可譯成《從哲學到小學》）中就曾中肯指出：“18世紀晚期的中國歷史，實際上是17世紀以來政治、學術變革的延續及其發展的極致，其影響甚至播及19世紀乃至20世紀。”^②艾爾曼論述道：“如同西方一樣，中國語言學歷史呈現出與自然科學實驗方法論發展有趣的相似之處。語言學的發展，歷史語言學、比較語言學的形成並不完全是西方學者的功勞。清代學者奠定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礎。我們在當代中國語言學研究中，仍可看到清代小學影響的痕迹。”^③

章太炎是在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走向現代語言文字學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承上啟下作用的偉大學者。馮勝利說：“章黃重功力，這自然不錯；但章黃更重‘發明’，其要諦在‘演繹’。”“事實上，章黃‘文獻語言學’中的‘演繹之法’並非憑空而來，它是乾嘉‘理必之學’的傳承和發展。”^④如果單純從學科發展而不是傳承的視角來看，章太炎的貢獻至少有兩條：一是透徹地論述了作為獨立學科的語言文字學^⑤，從理論上完成了語言文字學學科的現代轉型；二是著力培養了一支傑出的學者隊伍，從而形成了綿延至今並將不斷發揮積極影響力的章黃學派。

西方學科體系的全面引入是百年來中國學科建設的不爭事實，這種引入在促進當

① 詳參《音韻學方法論討論集》，商務印書館2009年。

② 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第3頁《著者初版序》），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同上，第153頁。

④ 馮勝利《新材料與新理論的綜合運用——兼談文獻語言學與章黃演繹論》，《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六輯第127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

⑤ 詳參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國粹學報》第24~25期）和《小學略說》（《國故論衡疏證》本第1~30頁，中華書局2008年）。

代中國科學研究事業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全面解構了中國古代學科體系。應該肯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這種接軌中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也應該看到，中國傳統的人文學科體系在未被充分認識其內涵與外延的情況下，遭遇倉促“並軌”；結果在“接軌”過程中被無端肢解而造成了削足適履的情形，由此影響了相關學科的良好發展，這是值得認真反省並深入檢討的。在國家學科體系的重建上，無論是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還是繼往開來的章黃學派，都沒能獲得機會發揮應有的作用，具有濃郁文史傳統和文獻考據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等歷史悠久、積纍豐厚、意義重大、學術生命力旺盛且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儘管在現實生活中和數學、物理、哲學一樣，幾乎時時處處都在發揮作用，但在現行學科分類體系中卻找不到應有的獨立的位置，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下面簡要介紹一下語言文字類學科在當代中國所使用的幾個國家級學科體系中的分布。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GB/T 13745-2009）

這一學科體系簡稱“國標”，主要使用在科研領域，包括政府課題申報學科體系的制訂，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等，與學位授予和本科辦學的學科目錄差距較大。國標共設5個門類、62個一級學科、748個二級學科。第五個學科門類為“人文社會科學類”，其下包括19個一級學科，“語言學、文學”作為一級學科並列。在這一學科體系中，整個中國語言文字類學科被壓縮在“漢語研究”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兩個二級學科之中，僅佔整個語言學諸多二級學科中的十分之二：

